

Gertude Himmelfarb 著

*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*

《新史學與舊史學》

Cambridge, Massachusetts: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7.

柳 立 言

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

“新史學”在歐美已年逾六旬，若干著作已有大陸的中譯本或台灣的翻印本。儘管如此，一般人士對“新史學”仍鮮有概括的認識，更遑論批評。Himmelfarb 是書，雖以書評為主，沒有全面檢討“新史學”的優點和缺點，但其涉獵甚廣，對個別問題鞭辟入裡；本文乃試綜合其散見各文之意見，從三方面指出“新史學”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的若干問題：(1)輕視政治史，(2)信賴社會科學方法，和(3)應用現代的歷史心理學。

自一九二九年《經濟及社會史年鑑》創刊迄今，原由法國年鑑學派執牛耳的“新史學”已成為歐美史學的主流。從大學以至中學，從有名的歷史雜誌以至國際會議，社會史、心態(mentalite)史、及經濟史取代政治、制度、及思想史，成為主要的歷史課題。“新史學”被號為史學界的“新正統”或“全部史”(total history)。“舊史學”的特點是依賴檔案、文集等史料，以敘述的方式，編年處理以政治、外交、思想、及傑出人物為主的「事件」；“新史學”的特點則是依賴統計圖表、口述採訪、社會和人類學模式，以及心理學理論，以分析的方法，環繞問題來處理事件背後所謂長時段的「深層結構」，

其對象是以普羅大眾為主角的問題，諸如婦女、家庭、階級、種族、社會機構、日常生活（如工作、娛樂、性行為、生老病死）、和城市問題（如犯罪、精神病患）等。這不單是研究對象和方法不同，而且是基本上新、舊史學對「什麼是歷史」有不同的見解，最明顯的莫過於新史學輕視政治人物和事件在歷史上的作用。

當希特勒個人的慾望和信念使歐洲陷入水深火熱之中，也幾乎毀滅了猶太民族及其根深蒂固的宗教時，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勞岱（Fernand Braudel）在德國的戰俘營中草成了《腓力浦二世（Philip II）時代的地中海及其世界》。他認為恆久不變的地理、人口、及經濟所產生的非人性力量才構成真正的歷史，腓力浦二世個人的慾望和文藝復興的思想只不過是“擲向歷史潮流的幾片貝殼。”政治事件也僅是一現的曇花。影響所及，到了一九八三年，三分之二的法國中學新生竟然不知道法國大革命何時發生。沒有政治史的歷史將帶來什麼問題呢？

忽視個別的政治人物，就是忽視他們作為人類所特有的思維和意志。假如說人類只能在所謂長時段的歷史中隨波逐流，則等於否認人類的創造能力和獲得自由的可能。同樣，假如說個別的政治事件本身沒有意義，而必須到其下的所謂「深層結構」中去找尋意義，則等於否認這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條件：人的動力及其背後的心志活動。禽獸只能適應環境，只有人類才能改變環境，這正是人類與動物的社會和歷史不同的地方。固然，政治少不了玩弄權術和權力鬥爭，但更有理想和目標——即有意地、小心地藉著「理性」的安排，創立政制，壓抑個人的慾望，追求大眾的社會福祉和國家利益，同時樹立道理和準繩，作為將來的問題的參考。簡單地說，研究政治思想和行為所產生的法律、法制、政治組織、權力分配，明白它們根據什麼道理和

理想去安排人類生活、組織社會、和預算將來，可以使人們明白是非，汲取過去並且已經成爲現在的一部分的理性經驗，並將之傳給後代。這是政治的最深意義，是歷史之所以強調「人文」的原因，也正是將歷史變爲社會科學的難處：例如在政治學裡，只有「行政人員」、「決策人員」的類別，容不下「政治家」；只有「選民」、「投票者」的類別，容不下「國民」。這樣就淹沒了人的個性和獨立思想，也說不出他爲何是甲國而非乙國的國民。新史學批評舊史學的英雄式歷史蔑視普羅大眾，或認爲政治與絕大部分民衆的日常生活無大關係。Himmelfarb 的意見正好想反：政治史讓一般人知道，他們並不單是普普通通的、過著日常生活的「社會」一分子，而是超過這些，是構成「國家」、構成其特有「政體」的一分子，也促使他們在危機發生時挺身維護這政體和國家。忽視政治史，等於忽視民衆曾爲政治拋頭顱、灑熱血的事實，也等於拋棄了一個國家的部分傳統，使過去和現在之間出現斷層。

新史學應用社會科學的觀念或理論來分析和解釋資料，而且爲了使歷史接近社會「科學」，特別重視所謂客觀的資料，即可以計算、量化、和按各種社會學科所設定的類別來歸類的資料；最後的目的，是建立模式。這種研究方式的主要問題有三：第一，在方法上，以理論或理論性的分析架構加諸歷史是倒果爲因的，因爲它預先知道結果或限定了所需的資料，只要在歷史裡挑出合適的資料便功德完滿。這種方法是將歷史變成理論的註腳，也是非人性和非理性的，因爲它否認古人在面對不可測的未來時有選擇的能力和可能。假如人沒有選擇，則其理性將無所用。就好像理論無法預測將來一樣，它無法滿意地解釋過去。

第二，理論應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特性，但其缺點是空泛或抽象

；對重視特定時空的歷史研究來說，難免不夠精確和貼切。首先，構成某一理論的一定項目，未必能夠與其研究對象的特點在數量上一一對應；無論是多於或少於這些特點，都無法符合這理論原來的邏輯和思辯過程。其次，這些項目與其研究對象的特點在內容上也未必能一一對應。今日社會科學的概念，如官僚、黨派、精英分子、利益團體，有時不但未能呈現其研究對象的特徵，反而產生簡化或扭曲。例如任何形式的政府、法制、政制，均被化約為“社會控制”；電視、考試、教育成了“思想灌輸”；團體旅行、主日禮拜也成了“社會同化”；這就未免是將今人的價值和問題強加古人身上了。更嚴重的是，在理論裡相關和重要的項目，在研究對象的實際環境裡未必同樣地相關和重要。例如古人對職業選擇、遷徙自由、婚姻自主，及同工同酬的要求，未必如今人緊要。假如認為今人的理論正可揭發古人潛意識的要求，掘出更深的真相，就未免是由今人來決定古人的生活何者才重要，且將其按現代的模式來重新安排了。研究歷史必須尊重事實；無論古人的思想行為多麼不符合現代的準繩，但只要它們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必須接受和作“歷史的”研究。

第三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在處理歷史資料時流於以偏概全，而且不盡翔實。以量化來說，主要缺點有二：(甲)只有將人和事的複雜性儘量簡化或分化才能進行量化，這樣就會把人和事的整體拆散，甚至失去原有的功能和意義。(乙)可以量化的項目往往只是表面的東西。以「家庭」為例，可以量化的，是成員的數目、年紀、性別、宗教；不可量化的，是成員的親情、相處狀況、和對「家庭」的價值觀。後者正是使客觀條件大致相同的家庭有不同發展的原因。因為不能量化而忽視後者，無疑是將人的生活拋棄一大部分。又例如「階級」，可量化的是教育、財富、職業，不可量化的是人的思想、情操、對「

階級」的道德要求。同樣是工人，有些勤勞，有些懶惰；同樣是資本家，有些放高利貸，有些辦義學義倉；同樣是貴族，有的高不可攀，有的深入民間。歷史的主角是人，而人可貴之處，不在乎那些可以量化的身外之物，而在乎情感、道德、和思想。罔顧問題的癥結所在而套用理論，結果不但是捨本逐末，而且不同學科的理論就會產生不同的解釋，表面上是科際整合，實際上是莫衷一是，使人無所適從，不知道那一種解釋才比較重要、比較接近歷史的真實。

新史學的另一特色是應用現代的歷史心理學，它與由來已久的從心理角度研究歷史是兩回事；簡單來說，後者是憑著足夠和直接的證據對合適的問題提出解釋，例如解釋人物的思想和行爲。現代的歷史心理學則是以某門某派的心理學理論，例如佛洛伊德或新佛洛伊德學說(Freudianism or neo - Freudianism)，去解釋問題。這些理論的基礎來自多次的臨床實驗，也就是以所謂科學的方法找出超越歷史時空的一般人性。既然如此，就歷史心理學家來說，這些理論不但可以克服歷史證據不足的困難，而且可以直探本源，揭發連當事人也許都不大清楚的靈魂深處。其中一個理論以爲人與生俱來具有戀父或戀母的情結(Oedipus complex)，其程度影響著人成年後의思想和行爲。因此，研究歷史人物怎樣渡過這情結階段，便可解釋他在日後의思想和行爲。Himmelfarb 對這種研究方法的意見可歸納爲三點：

首先，古人的心理資料，尤其是童年時代的，甚難齊備；而適用於大部分人的心理理論，又未必能細緻地適用於特殊的個人。心理分析家以爲是特殊的、個人的歷史背景，往往只是與今日的環境不同，所以才顯得特殊，實際上在當事人的時代只是一般的背景。在證據模糊的情況下引用大而化之的理論，就難免牽強附會，且自陷於歷史宿

命論 (determinism)之中了。

第二，解釋歷史的理論自應以當時的史實為主要資料，但歷史心理學的理論卻建立在現代人的資料上。古人與今人的行為也許有不少相同之處，但其出發點卻會因為時代環境的差異而大不相同。只看行為發生的形態而不考慮其發生時的特殊背景，就不免流於表面和似是而非。反過來說，在今人看來荒誕不經的行為，在當代卻可能是理所當然，這就不是單憑現代的臨床實驗所能理解，而必須訴諸歷史知識。

第三，這種研究將複雜多變的人和事簡單化或機械化了。首先，它認定了某種行為的背後必定有某種心理因素，而事實上同一行為在相同的環境下仍可有不同的動機；其次，它像有色眼鏡一樣，只看到合適的資料而罔顧其理論所無法涵蓋的資料，但後者有時更能透露當事人的動機。更大的缺憾，是心理學將人的心智活動視為生活感受（性情）。環境固然影響人的行為，但相同背景的人可以出現不同的行為，而有相同行為的人卻可有不同的背景，其中一個關鍵在乎人獨立的和理智的思考。在心理學看來是矛盾的行為，可能是當事人在不同的場合採取不同的思路所產生的結果，並不是因為當事人心理不平衡。所以，Himmelfarb呼籲，與其將思想作心理分析，不如先研究思想的思辯和邏輯結構，找出其內在的合理性。

總的來說，本書對“新史學”的作品不但有具體的批評，而且有原則性的探討，議論發人深省，是值得再三閱讀的好書。